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梁启超

# 诗文选译

● 马金科 ●



巴蜀书社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 梁启超诗文选译

马 金 科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责任编辑：罗 红

封面设计：李文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梁启超诗文选译**

马金科 译注

---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字数 165 千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7—80523—816—2/1·332

总定价：460.00 元（共三十九册）

##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主 编：戴 逸

副主编：杨东梁 段文桂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汝丰 王俊义 牛仰山 冯 杰

孙 静 李 侃 杨天石 杨东梁

杨宗义 张我德 胡绳武 郭毅生

段文桂 段志洪 龚书铎 程 歆

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编）

## 序 言

戴 逸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采，它的意义，比得过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

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悱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带引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颠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颖凛凛”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们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骛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裁，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的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无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邱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

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 前 言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近代著名维新派思想家、宣传家、政治活动家和学者。自幼聪颖过人，曾入广东学海堂学训诂词章。17岁考中举人。18岁入京参加会试，落第回乡时路过上海，读了《瀛环志略》及江南制造局译出的西书，开阔了眼界，开始注意世界形势，由此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并对于自己在广东学海堂所学的汉学进行反思。这年秋天结交学海堂的另一高材生陈千秋。他们相约去拜谒因1888年上书皇帝而闻名于世的康有为。在初次谈话中，康有为对梁启超所推重的训诂词章之学一一进行批驳，使梁启超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竟夕不能寐”。他决心放弃训诂词章之学，从师于康有为，成为康的入门弟子，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学习时期，帮助康有为编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协助康有为组织、发动“公车上书”。同年，康有为在京师发起组织“强学会”，梁启超为书记员，参加《中外

纪闻》的编辑工作。次年，任《时务报》撰述，撰写《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文，为戊戌变法起了重要宣传鼓动作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应黄遵宪约请，去湖南，任长河时务学堂中学总教习。在学堂内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培养出一批优秀学员，如蔡锷、林圭等人。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时期，受到光绪皇帝召见。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冬天，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宣传君主立宪，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清议报》共出100期，因火灾停刊，又继办《新民丛报》。在继续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同时，还积极提倡爱国主义，开发民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这时期重要论著有《戊戌政变记》、《过渡时代论》、《自由书》、《少年中国说》、《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新民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等。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至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梁启超等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民报》展开了论战。梁启超反对推翻清政府，对清政府的立宪抱有幻想。在资产阶级革命势力不断壮大，社会思潮的主流已经由变法维新转向民主革命的情况下，《新民丛报》不得已而停刊。此后梁启超又积极从事立宪的政治活动，与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相呼应，他在日本组织“政闻社”，并将总部迁到上海。然而，清朝统治者仍视梁启超为“叛逆”，而它本身也并无立宪诚意。此时，梁启超虽然无比愤懑，但仍继续支持国内立宪派的请愿运动，还撰写了《王荊公》与《管子传》，以肯定改革家的历史地位。1910年《国风报》创刊于上海，梁启超任总撰稿人。该报是继《新民丛报》之后立宪派的主要舆论

阵地。1912年（民国元年）冬经与袁世凯多次联系，决定与袁合作。回国后，先后任共和党、进步党首领，并积极向袁世凯出谋献策。又曾短期出任过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总长。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揭露袁世凯的野心，指出恢复帝制是自取灭亡，同时支持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不久，又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合作，1917年（民国六年）参与反对张勋复辟。1918年（民国七年）脱离政界去欧洲访问，列席旁听巴黎和会。回国后，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此后主要从事著述，提倡整理国故，也介绍西方当代哲学思想。后期的代表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历史统计学》、《五十年来进化概论》、《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等。1929年1月因病逝世，享年56岁。

梁启超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至1905年前的十年左右时间内，可算是“言论界骄子”。此时他先后办过三份报纸（《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积极鼓吹变法维新，成为当时著名的宣传家。他批判封建旧学，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开发民智，在当时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他批判旧史学，提出新史学的观点和方法，成为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人。他还提出整理研究历史文化遗产，初步论述了批判继承问题。他对问题涉猎之广，著述之多，在同时代很难找出第二人。

梁启超是一个勇于反省自己的人。他曾说自己治学的毛病是博杂而不精深。有人认为他的文章不如严复专精典雅，不如章太炎深邃古奥，但是梁启超的文章比严、章等人，更能获得青年人的欢迎。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一书中曾说：梁启超“是资产阶

级革命时代有力的代言者”。严复也说过他的宣传鼓动性文章对促进清朝覆亡是有作用的。

梁启超曾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苟有所进，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他的观点和政治主张几次发生变化。戊戌变法失败后，在国外与康有为打起了保皇的旗帜。他曾高唱“破坏主义”，后来对慈禧太后所颁布的预备立宪又抱有幻想。他积极主张君主立宪，但又提出“开明专制”。他曾寄希望于袁世凯，帮助袁世凯排挤过革命党人，但在袁世凯称帝时，他支持蔡锷发动了反对袁氏复辟的护国战争。“五四”时期，他说：“我很盼望最近的将来，有真正的国民运动出现。倘若有么，我梁启超应该使我的舌头和笔头来当个马前小卒”。可是当工农革命兴起时，他站到了反对的立场。梁启超的多变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从客观来看，是晚清至民国初年，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从主观来看，是梁启超在不断地追求一个能推进中国进步的政治模式，只是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使他无法找到一条真理之路。尽管他晚年说了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话，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梁启超终其一生是一个爱国者。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是一个热烈执着、充满生活热情的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尽管他不能冲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樊篱，但他已认识到局限所在。他说：“自己发现了一个罪恶就是：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个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的，或不愿共事的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身上一直存在着那么一种追求前进

的真情。

梁启超在文章和书信中曾提到自己是一个重感情的人。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往往在文论中流露出一种激情，所以，他的文章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他曾说过，当他阅读龚自珍的文章时“若受电然”，进而又感到浅薄。同样，梁启超的早期文章充满激情与鼓动性，但也往往失于不够深刻。在译述他的文章时，如何将他的精神情感译出来是有一些难度的。

梁启超一生从事很多政治活动，同时也是著述等身。有人统计他的著述约有 1400 多万字（这个数字估计是偏低的），内容包括了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财政学、伦理学、经学、佛学等。他才思敏捷，学识渊博，文字通顺流畅，生动活泼，是“新文体”的倡导者。梁启超的文章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宣传鼓动性很强，对社会震动很大。在学术著述中也往往充溢着政治气息，优点是不躲躲闪闪，直接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有人曾评论他的文章是“骨子里常带政治气味”。由于梁启超著述影响很大，在他生前即有人为他编文集。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何擎一（天柱）编《饮冰室文集》，此后 30 多年内，大约有 40 种不同版本的文集问世，其中以 1936 年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最为完备。

梁启超的著述可分为几个阶段。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至戊戌变法时期，他受康有为疑古思想与今文经学思想影响较大。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时务报》创刊后，是他这一时期写作的高峰期，如《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古议院考》等文，大都依据初步的进化史观和今文经学观点写成。本书中所选录的《变法通议·自序》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梁启超从地球的

形成到人类社会的产生，论述了自然界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阐明变革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道理，他历述了中国历史上官制、兵制和赋役制度的演变，证明“变亦变，不变亦变”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而且警告说，如自己不变法，别人就会来替你变；守古不变，国家就没有前途。这些论述在变法维新时期，其震动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他的文章打动了无数读者，以至“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zōu）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这时期的著述大都表现出年轻气盛，宣传鼓动性强，敢于下结论，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尚处在新旧转换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生搬硬套的毛病。如《古议院考》中，梁启超将汉武帝时选用一批官秩较低的官吏组成“中朝”为皇帝办事，说成是早期的议院，这种简单的援古议今是当时维新派的通病。严复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曾致信梁启超指出了他的不确切，并向他介绍了自己翻译的《天演论》。本书中所选的《与严幼陵先生书》就是梁启超的复信。他一方面接受了严复的批评，但也提出了不同看法，并且在字里行间还透露出一种少年得志的情绪。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后，梁启超在日本阅读了大量西方书籍，他看以往从未见过的书，从未听到的理论，真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他说自己不想将这些“开民智”、“强国基”的知识据为己有，所以“汲汲将译之，以饷我同人”。每当他看过一本书，了解到一种思想后，便立即通过《清议报》与继《清议报》创办的《新民丛报》进行介绍和宣传。从这些论著中可以看到他对祖国的关心和热切期望，同时也表现了在异国他乡的惆怅心情。1899年至1905年（光绪二十五年——三十一年），正是梁启超从一个热血青年进入而立之年的时期，这时期的著述说

理性较强，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抨击比较深刻，既有热情激扬的文字，又有对祖国前途的深沉思索和期望。本书以选录这时期的文章为重点，如选录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新史学》等都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因为《新民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新史学》文章长，内容多，选录时采取了摘选的办法。这一时期，虽然梁启超仍坚持改良的政治主张，但他的著述涉及面很广，对某些问题的论述是很有创见、很有深度的。本书摘选的《新民说》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梁启超对“新民”的含义，解释是要有民族精神的国民。所谓民族精神并不是固守旧习，而是要吸取外来优秀的东西，不断更新自己。既不要像“心醉西风者流”，否认中国数千年的传统而盲目学习他人。又不要像“墨守成规者流”，死抱着旧传统，拒绝吸收外来文化。只有这样才能自新，才能前进。他还提出了“公德与私德”、“权力与法制”、“自由与克制”等问题，论证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今天看来，他的言论参考价值仍然存在。又如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写的《新民议·禁早婚议》一文中，实际提出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的优生优育问题。梁启超在论述中虽有个别不当之处，但从文章的总体来看是论述改变封建陋习提高人民素质的问题。国家的强盛与人民素质水平的提高直接相关。20世纪初，梁启超将其作为“新民”的重要内容提出是有眼光的。另外，从《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中，可以看到他对祖国未来充满希望，热切地期望国人都来关心国家命运；有激情的陈述，也有辛辣的讽刺。除此以外，还选了他对学术思想发展和史学评论的看法，虽然认识还不算深刻，但反映了与旧传统思想不同的新观点。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后，由于梁启超忙于与革命派进行论战。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后又进行了立宪的活动，这时书信较多，具有代表性的长篇著述有《王荆公》、《管子传》，目的是为历史上的改革家鸣冤，颂扬其改革成就，肯定其历史地位。在这一时期，选录了一篇散文《嘉应黄先生墓志铭》。这是一篇颇具特色的散文形式的墓志铭。梁启超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黄遵宪一生的事迹，重点突出了他在外交方面、维新活动中的成就，以及在“诗界革命”中的贡献，是黄遵宪死后最早全面介绍他的文章，为后人研究黄遵宪提供了很好的素材，铭文写得也很生动。

1912年（民国元年）后，梁启超曾经在熊希龄内阁中担任过司法总长。这时期他比较注意立法与财政问题，写了几篇有关这些方面的文章，但具有代表性和产生较大影响的著述是《欧洲战役史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本书摘录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的大部分内容。梁启超批评了“筹安会”中某些人怂恿袁世凯复辟，轻率地决定变更国体，指出复辟帝制会使中国丧失希望。同年，他在致袁世凯信中更提到“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梁启超采取了劝诫、揭露、指责并举的方式，说理性较强，层次分明，文字跌宕起伏，可读性很强，既是一篇政论文章，又是一篇好散文。

1917年（民国六年）底，梁启超辞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职务后，大力研究碑刻、金石，撰写了不少跋文。本书中所选录的《秦琅邪台刻石》一文，即此时期颇具新意的一篇。他从秦始皇刻石颂功，李斯篆字的珍贵与琅邪台刻石坠海后联想到帝制的



结束，在短短一百多字中写得很有起伏感，并发人深思。

梁启超的欧洲之游与欧游归来直到逝世，是他思想的又一变化时期。他介绍了西方当代哲学思想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和以詹姆士为代表的“实验主义”。他以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写了一些有关著述，例如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地理与年代》等篇中都强调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的变化中观察历史的因果关系；又强调“自由意志”是推动历史的动力。同时还提出“心力”与“物质基件”相应社会才能发展等。梁启超在后期还提出“整理国故”，与胡适竞相拟出古书阅读书目，研究儒家思想，旁及老庄、法家、墨子等。他的后期学术著述很多，思想也比较复杂，对其著述思想的评价与历史地位，还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所以本书一般没有选录。考虑到为了解梁启超后期的散文特点与生活情趣，在篇幅有限的情况下仅选了《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美术与生活》两篇。

在诗词方面，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积极倡导者。他曾赞赏夏曾佑、黄遵宪以新思想、新词汇镕铸诗中，将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称为“近世诗界三杰”。梁启超的诗受上述人影响，在初期的词诗创作中不过分注意格式，热情奔放，通俗流畅，直抒胸臆，忧国忧民思想充溢诗中。后期诗词功力渐深，用词方面也趋于典雅，往往采取比拟的手法抒发情感，反映了思想的深沉。本书所选的《和夏穗卿》一诗反映了在戊戌变法前忧愤时局的心情。《去国行》、《志未酬》、《爱国歌四章》、《壮别》，与词作《水调歌头》、《贺新郎》都代表了初期的诗词特点。《东归感怀》、《归舟见月》与词作《浪淘沙》代表了功力趋于成熟，讲究用词与典雅的表达方式。